

荀 况

(约公元前 313—前 238 年)

濮之珍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汉人避宣帝讳，称荀卿为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今山西南部），他是公元前 3 世纪我国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也涉及语言学的理论。

—

《史记》有《孟轲荀卿列传》记载了荀子的生平事迹。再参看《荀子》一书，可知其生平梗概。荀子虽是赵国人，一生活活动面很广。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他是战国末期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为了实现其理想抱负，也曾像孔丘、孟轲那样，周游列国。当时，齐、鲁是文化中心，天下名士曾齐集在齐国的稷下，如淳于髡、邹衍、田骈、宋钲、尹文、鲁仲连等，最盛时有数千人之多。荀子东游于齐，曾在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讲学，齐襄王时曾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大学长），影响很大。

在政治思想上，荀子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在哲学思想上，荀子发展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殷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宣扬“天”可以主宰一切的有神论观点，假托“天命”来强迫奴隶们供其驱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衰落，“天命”思想也

发生动摇。荀子批评天命、鬼神迷信之说。荀子认为“天”不是神，而是物质性的自然界。比如列星旋转、日月照耀、四时交替、风吹雨降等，不是“天神”的意志，而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而，荀子又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能胜天的思想。荀子还认识到自然界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在《天论篇》中明确指出“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又说“天有常道”；“地有常数”；“常”就是规律的意思。他还运用人们生活中切身的经验，来生动地证明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意思是说：天并不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地也并不因为人们嫌远就缩短距离。可见，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自然界总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在运转。

荀况著有《荀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 西汉刘向《孙卿新书叙录》定为三十二篇。唐杨倞改名为《荀卿子》 简称《荀子》。今本《荀子》即杨倞据刘向辑本重新编排的。其中《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或系门人弟子所记 参见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一说《仲尼》篇亦为后人之作 见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一书 总结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

《荀子》书中如《天论》是阐述自然观的如《解蔽》、《正名》，是阐述认识论和思想方法 并对语言学理论有卓越见解；《性恶》是阐述人性论的；《劝学》《修身》是阐述教育理论的；《议兵》是谈军事思想；《礼论》、《王制》、《王霸》、《富国》等篇是谈论社会政治思想的；《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部分是评论先秦诸子的；《成相》篇，运用民间文学形式来说明为君、治国之道；《赋篇》是荀子写的文学作品，是一种散文的赋体，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可见，荀子学术思想丰富。《荀子》一书 主要注释本有唐杨倞《荀子注》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

二

先秦时期，语言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荀子也不是语言学家。不过，他具有进步的唯物的观点，在阐述认识论等哲学思想时，对语言学理论，如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与思维、语言的发展等问题，有卓越的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很精辟，有启发性。

荀子的一生活活动范围很广，走遍了当时的各诸侯国。他曾经南到楚国，北到燕国，燕楚相去不下三千里，又曾东到齐鲁，西到秦陇，齐秦相距也约三千里。荀子是赵国人，在齐、楚两国居住较久，由于社会实践，使他对汉语的各地语言具有丰富的知识。荀子的著作，反映了他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卓越的、科学的思想认识。

1. 论词和概念、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早在公元前 3 世纪，荀子对语言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一理论观点就有所认识。他在《正名篇》中说：

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冷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

荀子首先指出：人们是通过视觉、听觉、味觉等感觉器官来认识客观世界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接着他又指出：

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

这段话,可以有两层意思。第一,荀子认为人类通过感官获取感性认识以后,“心有征知”即对感性认识要进行思考,加以分别取舍;也就是说,人类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才有理性认识的。第二,荀子又指出理性认识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大脑要进行思考,必须在各种感觉器官各自接触外界的基础上进行。如通过听觉知道声音,通过视觉知道形状等,即“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

荀子所说的“心有征知”是指大脑进行思考,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人们对丰富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以形成概念,然后又用语词来表达概念。荀子在《正名篇》中指出: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在以上这一段文字中,荀子指出,客观事物是丰富复杂的,人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对于丰富复杂的客观事物加以抽象概括,即“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从而形成概念。概念是在语词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知异实者之异名也”。也就是说,人们在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下名称时,是分别取舍的,同类则同名,异类则异名。人们对不同的客观事物,形成不同的概念,取不同的名称,单名可以表达的,用单名,单名不够表达的,则用复名。《荀子集解》王先谦注曰:“喻其物,则谓之马。喻其毛色,则谓之白马、黄马之比也。”

人们具有了抽象的语言思维，就可以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由于抽象概括的范围、程度、大小不同，荀子在这里细致地分别指出“有‘物’这样的大共名，还有‘鸟兽’这样的大别名；从而科学地指出词语和概念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揭示了词的概括性。荀子这两点理论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来看，语言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人类是通过语言进行抽象思维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如果没有语言，任何知识的代代相传、任何思维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指出：“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力量之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荀子指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意思是说，概念的形成是抽象概括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再用词语来表达的，因此，语言中的词具有抽象概括性。这一理论观点也是很重要的。

2. 论语言的社会性

“名”和“物”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很关注。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对“名”与“实”的问题，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荀子在先秦诸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提出了科学的看法。现将先秦诸子对“名”“实”的看法，简介于下：

首先，孔子提出“正名”主要是从政治上讲名分。他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正名的主要内容。他对名分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客观事物即“实”与表达概念的词语即“名”之间关系的看法。孔子认为当时政治上的混乱，是由于“名”不正而引起的。他把“名”看成为第一性，认为现实世界的“实”违反了周公所制定的“名”，这才引起许多反常的现象。孔子为挽救周礼崩坏的残局而提出要“正名”，这是把“名”和“实”的关系倒置了。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说的“常名”是指与客观事物有本质联系的概念，而“可名”则是指表达概念的名称，即词语。“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是说：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并不是那经常不变的名。在这里，老子指出名称与客观事物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它只不过是表达概念的符号。老子又进一步说“无名，天地之始”即天地万物本来是没有名称的。但是，他并没有片面否定“名”的意义，而是辩证地指出“有名，万物之母”，第一个指出了“名”“实”不可分。老子对“名”“实”的看法，有较大的影响。

墨子在《贵义篇》中就说：“譬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杨朱也说过：“实无名，名无实，名实伪而已矣。”意思是说，事物是没有名称的，名称不就是事物，名称不过是假定的符号而已。可见墨子和杨朱在“名”“实”问题上，是接受了老子的部分看法，即着重指出名称和客观事物间那没有本质联系、没有必然联系的一面。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在先秦诸子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看法。他在《正名篇》中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以上这段话对“名”和“实”的关系，也就是名称和客观事物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

荀子科学地指出“名无固宜”，就是说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一开始时，是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否则，世界上各种语言应该一样，事实上各种不同的语言，是用各种不同的词语形式来表达同一客观事物的。可见，名称不过是人类社会为了表达客观事物而假定的各种符号，即“约之以命”。但是，这个假定并不是

个人意志的武断的假定 而是人类社会的“约定俗成”。而且 事物的名称,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以后 任何人就不可以也不可能随便更改了,正如荀子所指出的“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因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个人是无法随便改变语言的。在这里 荀子深刻地揭示了“名”和“实”的辩证关系,“名”对于“实”既不是本质联系,也不是个人意志的武断符号。客观事物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定下名称以后,就具有客观内容和社会内容,而不再是什么假定的符号了。荀子的卓识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

荀子论述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这很重要。有些学者往往对词语和客观事物开始时没有本质联系这点,加以夸大,即夸大词的任意性,说语言是一种武断符号。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第一,词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一开始虽不是必然的,但不能说所有的词都是任意的。例如,一、二、三、四、五,开始带有假设性,但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词语,就不能说是任意假设的了。因为语言里任何新词的构成,都要受每种语言体系和各个语言要素之间规律性制约,语言不能也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武断符号。第二,词和客观事物,在一开始时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某一客观事物,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定下名称以后 这个词语 就具有客观内容和社会内容,是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动的。据说在秦朝的时候,大臣赵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 硬要“指鹿为马”事实上 语言并没有因为他的骄横无理而有任何改变。马仍旧叫马,鹿仍旧叫鹿。

关于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学界曾有长时期的研究和争论,如19世纪西方语言学,就由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同,而形成各种学派,如自然主义学派,他们把语言看成自然现象;个人主义学派,把语言看成个人现象。西方语言学中的大师索绪尔,他看到语言有属社会的一面,也有属个人心理的一面,形成心理社会学派。在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学派影响较大,他们重视语言

的结构体系的分析研究。总之，语言的本质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语言的根本看法，指导着语言学的研究方向，所以历来有许多语言学家重视这个问题，并因此形成各种学派。当然，对于语言的本质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不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从语言的社会实践来看，我国公元前 3 世纪战国时代的荀子说得好：“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段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名称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也第一个科学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

3. 论方言和共同语

春秋战国时代，汉语方言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有南北两系：南系有楚语、越语，北系为夏语。荀子在《儒效篇》中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又在《荣辱篇》中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这一段文字原义是讲风俗习惯的，按荀子的意思，语言亦属风俗习惯。从语言的社会性来看，荀子的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荀子一生活活动面很广，周游列国，到过很多地方，因此语言实践丰富。他对当时丰富复杂的汉语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他深刻地看到语言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因而精辟地指出语言的社会性。他又观察分析出，当时汉语中有的地域方言，即“居楚而楚”、“居越而越”，而另外，还有一种超越地域方言的“雅言”（也就是夏言），也就是当时通行地域较广的汉语共同语。荀子的这种分析和认识，是符合当时汉语的语言实际的，汉语自古以来就有共同语和方言两种形式为汉族人民服务。过去，有的西方语言学家，片面强调汉语方言分歧，错误地说汉语没有共同语。其实，汉语自古以来就有共同语，现代汉语的民族共同语，源远流长，就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话”。

4. 论语言的发展

荀子还具有发展观点，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荀子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杨倞注曰：“名之善者循

之不善者作之。’这就是说当社会、政治发生较大变革时，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语言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组成的，其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词汇。有新词的产生，有旧词的消失，还有许多基本词汇继续使用。荀子对丰富复杂的语言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后，一方面指出社会有了发展变化，即“若有王者起”，语言亦有发展变化，即“有作于新名”；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有循于旧名”的继承性和稳固性。荀子的这种分析、认识，也是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的。

总之，早在公元前 3 世纪，我国战国时代的荀子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个语言学家，他对语言与思维、语言的社会性、方言、共同语以及语言的发展等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阐述。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

史 游

(? —?)

濮之珍

史游 西汉时人 汉元帝时曾官黄门令。他精字学 著有《急就篇》 善书法 后世称他所书为“章草”。秦汉时期 重视识字教育，先后有《仓颉篇》等八本童蒙识字课本 但只有史游《急就篇》流传下来。虽然史游的生卒年、生平事迹不详，但其著作代表了秦汉时期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的风尚。本文联系《急就篇》一书，评介于下。

—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发展，出现了大批杰出的人物；在语言学方面，也出现了语言学家扬雄、许慎等。这个时期，在语文规范化工作方面，也有所建树。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秦以前，是“田畴异亩 车涂异轨 律令异法 衣冠异制 言语异声 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重大措施是“书同文”就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统一规范化的工作。

周代的文字为大篆，又称籀文，这种字体笔画较繁。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笔画较大篆省略。王国维撰文《战国时秦

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说明秦之小篆本出大篆 所谓秦文 即籀文也。又说：“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 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 用古文不用大篆 是可识矣。”说明了当时文字是不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采取李斯的意见 推行统一文字、语文规范化政策 即以小篆为规范正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淘汰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秦代对语文规范不仅有政策 也有措施 即编写了学童识字课本 计有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等。这些字书的字体 都是用小篆书写的 以示文字正字的规范。这在当时 对推行文字统一、语文规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秦统一后，一方面以小篆为正字规范 推行文字的统一 另一方面在汉字书写上也有重大的革新 即隶书的出现。隶书 开始于秦 普遍使用于汉、魏。晋代卫恒《四体书势》上记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 篆字难成 即令隶人 指胥吏 佐书 曰隶字。”隶书的结构和小篆不同 小篆是用圆笔 而隶书改用方笔 可以说隶书打破了篆书的传统 奠定了楷书结构的基础 提高了汉语书面语书写的效率。隶书的出现，揭开了汉字书写体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秦朝统治的时间不长 继之而起的是两汉 统治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这个时期 国家更加统一 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文规范化等方面 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语文规范化工作方面 识字教育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从周代起 就有“小学”。“小学”就是识字教育。不过 在周代教育制度中，小学本指学习六艺和六仪。后来小学的含义逐渐缩小 仅指六艺之一的“书”了。“书”即专指关于语言文字的学习 如《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只收童蒙识字课本。远在春秋战国之间，就有《史籀篇》 这是当时秦国教育学童识字的课本。秦始皇统一后 实行“书同文”的语文规范化政策。到了汉代 将秦代流传下来《仓颉篇》等三本识字课本 合称《仓颉篇》 又称“三仓”共收字

3300 个。另外 汉代又新编了新的识字课本 计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和扬雄的《训纂篇》等。从《仓颉篇》到《训纂篇》收字已经增加到 5340 字了。到了汉和帝时代 公元 89—105 年 贾鲂又写了《滂喜篇》。以上共计有八部字书，可见当时对语文规范、识字教育的重视。秦汉时代的八部字书 只有史游《急就篇》流传下来，《仓颉篇》有残简 其他字书都已亡佚了。

二

史游 西汉人 字、里不详 汉元帝 刘奭 时曾任黄门令 精字学 善书法。《汉书·艺文志》记载 史游著《急就》一篇 或称《急就篇》至《隋书·经籍志》上又称《急就章》 后世因此称他所书为“章草”。秦汉时代 因篆字难成 变篆为隶 而史游“章草”则进一步解散隶体 首创章草之法 为后世书家效法。《急就篇》有颜师古注及王应麟补注 现有《四部丛刊》本。

《急就篇》今本三十四章 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 多数为七字句 以教学童识字。全书取首句“急就”二字作为篇名。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云：“急就者 谓字之难知者 缓急可就而求焉。”《急就篇》共收字 2016 字 无一重文 文辞雅奥 非后世蒙书所能及。开首五句，说明了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和宗旨：

急就奇觚与众异 罗列诸物名姓字 分别部居不杂厕 用日约少诚快意 勉力务之必有喜。

“急就”就是速成的意思。“觚”是学习识字用的木板。“奇觚”颜师古注：“奇好之觚”。全句的大意是说 这本速成的奇妙的识字课本，与众不同。第二句、第三句是说这本书的体例是按

姓名、衣物等分类编排的。第四句中的“约”即少的意思。“用日约少”就是指所费的时间不多，也就是“速成”的意思。说明他编的这本《急就篇》是一本速成的识字课本，只要好好学习，则“必有喜”。

《急就篇》第一部分列举了一百三十二个姓，凡单字姓加二字、复姓加一字成三字句。例如：

宋延年 郑子方 卫益寿 史步昌 周千秋 赵孺卿 爰展世
高辟兵 邓万岁 秦妙房 郝利亲 冯汉强 戴护郡 景君明，
董奉德 桓贤良……

上述这些姓名，并非真有这些人，史游是把一些抽象名词、动词、形容词编成姓名形式，三字一句，以便于学童识字学习。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姓名迄，清言物”，依次叙述了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丧葬等方面，都组成七字一句，有韵，读起来顺口。例如：

锦绣纁旒离云爵 乘风县钟华洞乐 豹首落莫兔双鹤 春
草鸡翅鳧翁濯。……赏贷卖买贩肆便，资货市赢匹幅全。
……稻黍稷稷粟麻稭 饼饵麦饭甘豆羹 葵韭葱 薺蓼苏姜 芡
萸盐豉醢酢酱。……梨柿柰桃待露霜 枣杏仁棗橄怡饴 园菜
果蔬助米粮。……

关于人体各部分，《急就篇》上记载有：

头额頰 颞眉目耳 鼻口唇舌龈牙齿 颊颐颈项肩臂肘 卷
挽节爪拇指手。脾腴胸胁喉咽髑 肠胃腹肝肺心主 脾肾五藏

臄齐乳，股脚膝腴胫为柱。踳蹠跟踵相近聚。

《急就篇》第二部分 内容较多 写的是“诸物”是粗分类。“诸物尽讫五官出”，《急就篇》的第三部分写的是“五官”方面的字 如：

宦学讽诗孝经论 春秋尚书律令文 治礼掌故砥厉身 智能通达多见闻 名显绝殊异等伦 抽擢推举白黑分 迹行上究为贵人 丞相御史郎中君。……

全书最后用四字句歌颂汉代的盛世，为：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 阴阳和平。风雨时节 莫不滋荣。灾蝗不起 五谷孰成。贤圣并进 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就是从汉代留传下来的一本完整的识字课本，其中很多字词一直延用至今。这正说明了汉语源远流长，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 另外，《急就篇》字书也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

汉代重视语文规范、识字教育，除编写了多种识字课本外，还定下了有关语文规范的奖惩政策。《汉书·艺文志》上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汉兴 萧何草律 亦著其法 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 史书令史。吏民上书 字或不正 辄举劾。’六体者，

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说：“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汉代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化。学者十七岁以上，经考试能“讽籀书”九千字者就可以担任官职，又考试八体。八体见《说文解字序》，是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凡考试“八体”优良者可以官尚书史。另一方面，官吏上书皇帝，若写了错字，经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外罚以致判罪。可见汉代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化，奖惩很重，把识字教育，语文规范提升到朝廷取士准则的地位。所以在汉代，史游等撰写字书以后，“通小学者”都是很受尊重的。

《汉书·艺文志》又记载：“仓颉按指《仓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诂，并列焉。”这一段记载说明，由于《仓颉篇》上写的多是古文，汉代的教师，有时要读错，汉宣帝时特地征召齐国人能“正读”的来朗读，再由张敞传受下来。到了元始年间，又征召全国通小学的一百多人，让他们在朝廷把所认得的字记下来，可见当时朝廷对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的重视。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写《凡将篇》，著名辞赋家、语言家扬雄写《训纂篇》也可见“识字”教育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史游《急就篇》流传下来，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字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而且《急就篇》一书不是简单地把许多单字放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加以组织，开始部分有三字句的姓氏，第二部分是七字句的“百科”。这样学童一面学习认字，同时还能增长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全文典雅、有韵，也便于学习。

《急就篇》能完整流传下来，和唐颜师古为之作注有关。《急就篇》有过一些注释本，但自唐颜师古的《急就篇》注本出，其他注本就被淘汰了。《急就篇》流传下来，有不少讹误，颜师古首先改正讹

误加以系统整理并精心为之作注。例如，《急就篇》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颜师古注曰：

觚者学书之牋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孔子叹觚即此之谓。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言学僮急当就此奇好之觚其中深博与众书有异也。班固《两都赋》曰：“上觚棱而栖金爵”。今俗犹呼小儿学书简为“木觚章”盖古之遗语也。

颜师古还在《序》中评论了《急就篇》在古代小学上的地位和价值。他说：“《急就篇》虽然‘文非清靡，义阙经纶’但是此书‘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者焉’”。可见他认为《急就篇》一书其中蕴涵了精深的学问，是一部使初学者博闻广识、开拓视野的重要典籍。古代字书有多部，史游《急就篇》所以能完整流传下来，颜师古为之作佳注之功也。

扬 雄

(公元前 53—公元 18 年)

濮之珍

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 蜀郡成都人(今属四川省)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新莽天凤五年。他是西汉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

扬雄生当西汉后期,先世是周朝伯侨的后裔,封在晋之扬地,因以为氏。周衰时扬氏称侯。扬雄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后来“, 世世以农桑为业”到了扬雄时家中只“有田一壥 有宅一区”, 家庭不过十金 乏无儋石之储(《汉书·扬雄传》)。当时农民起义、王莽篡夺朝政 国事日非 社会动荡不安。《汉书·扬雄传》上还说 扬雄为人简易佚荡、少嗜欲“非其意虽富贵不事”; 默而好深湛之思”。他患口吃 不善言辞 但他自幼好学 博览群书 讲究通贯 学问渊博 成为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学者。

扬雄早年 酷好辞赋 创作取法于屈原、司马相如。汉成帝元延元年 公元前 12 年 前后 扬雄四十多岁时 从四川家乡来到京都长安, 经蜀人杨庄引荐, 受到喜爱辞赋的汉成帝召见。一年后, 扬雄成为皇帝身边文学侍从之臣。这段时间 他继续读书 并为他后来编撰语言学专著《方言》搜集了不少宝贵资料。据《汉书·王贡